

明代状元别集文体分布情形考论

陈文新 郭皓政

明代状元别集中涉及的文体,近七十种,可分为诗、文两大类。在“文”中,赠序类、碑传类、书牋类数量最多。在“诗”中,近体诗尤其是七律倍受青睐,词曲则相对受到冷落。这些事实表明,明代的主流文学观念依然是一种杂文学观,高度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和实用价值。20世纪30年代以降的文学史著作,往往用纯文学观来考察中国古代文学,有时难免削足适履,并因侧重于框架的建构,而忽略了文学史上大量意味深长的细节。

与唐宋相比,明代科举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变化,例如状元的身份不再是一种俗称,而是得到了官方的正式认可;明代状元,可以直接进入翰林院。由于翰林院既是一个综理人文的机构,也是一个储养朝廷大员的场所,这就使明代状元具有了双重特殊性:他们既是联系官方文化政策与整个文坛的纽带,又极有可能成为朝廷大员。这种特殊性必然导致明代状元的写作不同于一般作者。而由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其间也会出现若干特例。这两个方面都在我们关注的范围之内。

一、明代状元别集存佚考

明代共有89名状元,经初步调查,其别集现存者不下45人。其存佚可大致分为三种情况:

(一)别集不存者。有些状元的别集现已不存,且未见文献著录,而以明初和晚明居多。这些状元包括:张信、陈郊、韩克忠、李骐、邢宽、林震、曹鼐、施槃、朱希周、杨维聪、韩应龙、沈坤、丁士美、范应期、张懋修、翁正春、黄士俊、韩敬、周延儒、余煌、刘若宰、陈于泰、魏藻德等,共计23人。这些状元无别集存世,原因主要有:1. 政治原因,包括战乱。如张信、陈郊都是洪武朝状元,在洪武朝科场大案——“南北榜”事件中,惨遭杀害。韩敬是万历三十八年(1610)庚戌科状元,因科场案罢官归乡。曾编《东林点将录》,对东林党人进行攻击,后不知所终。周延儒、魏藻

德位至首辅,周延儒被《明史》列入《奸臣传》,魏藻德卖国求荣,其别集俱不传。余煌曾率兵坚持抗清,殉国前叮嘱仆人死后“不刻文集”^①。2. 早逝。李骐、邢宽、林震、施槃、沈坤、范应期等状元,都去世很早。如施槃是正统四年(1439)己未科状元,二十三岁中状元,二十四岁就去世了。不排除这些状元中的个别作者曾有别集行世、甚至有流传至今的可能性,但迄今尚未发现。

(二)别集仅见于文献著录者。根据《千顷堂书目》、《明史·艺文志》以及状元的碑传志铭等有关文献的确切记载,有些状元生前或者死后曾经有别集行世,但是否仍存于世,需要作进一步的调查。这些状元包括:丁显、黄观、萧时中、马铎、曾鹤龄、刘俨、孙贤、曾彦、王华、李旻、伦文叙、唐皋、姚涑、茅瓚、秦鸣雷、陈谨、诸大绶、朱国祚、庄际昌、刘同升、杨廷鉴等,共21人。《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禁毁书丛刊》、《续修四库丛书》、《四库未收书辑刊》、《丛书集成(初编、新编、续编、三编)》中都没有这些状元的别集。《明别集版本志》等亦未著录这些状元的别集。

(三)别集现存者。明代状元别集存世者共计45人,约占明代状元总数的50%。有些状元,其存世的别集可能只是残本。如吴伯宗曾有《南宫集》、《使交集》、《成均集》共二十卷,以及《玉堂集》四卷,现仅存《荣进集》。从《荣进集》中的作品看,内容颇为混杂,大概是原集散佚后,后人掇拾残篇,合为一编。又如罗万化的《世泽编》,原本或应为十六卷,现仅残存文部的五、六两卷。有些状元存世的别集有多种,如《千顷堂书目》卷二二著录的杨慎别集有:“杨慎《升庵文集》八十一卷,又《升庵合集》二十卷,又《升庵遗集》二十六卷,又《升庵诗》五卷,又《南中集》七卷,又《七十行戎稿》一卷,又《归田集》,又《晚秀集》,又《升庵长短句》四卷,又《升庵外集》一百卷(焦竑辑),又《读升庵集》二十卷(李贽),又《升庵诗选》二卷(林兆珂辑)。”^②杨慎著作之丰,在明代首屈一指。他的这些别集,大部分仍存于世。明代状元别集存世的数量还是非常丰富的。

大部分现存的状元别集,可以从一些大型丛书中找到。有6位状元的别集被收入《四库全书》,分别是:吴伯宗《荣进集》,柯潜《竹岩集》,罗伦《一峰文集》,吴宽《家藏集》,谢迁《归田稿》,康海《对山集》,杨慎《升庵集》,罗洪先《念庵文集》。有8位状元的别集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分别是:陈循《芳洲文集、诗集》,陈循《芳洲文集续编》,柯潜《竹岩集》,黎淳《黎文僖公集》,费宏《太保费文宪公摘稿》,康海《康对山先生集》,康海《汴东乐府》,吕柟《泾野先生文集》,杨慎《升庵长短句续集》,焦竑《焦氏澹园集》,焦竑《焦氏澹园续集》。有22位状元的别集被收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分别是:胡广《胡文穆公文集》,曾棨《曾西墅先生集》,陈循《芳洲文集》,陈循《东行百咏集句》,马愉《马学士文集》,周旋《畏庵周先生文集》,商辂《商文毅公集》,彭时《彭文宪公集》,彭教《东泂遗稿》,张昇《张文僖公文集诗集》,费宏《明太保费文宪公文集选要》,费宏《宸章集录》,钱福《钱太史鹤滩稿》,毛澄《三江遗稿》,顾鼎臣《顾文康公文草、诗草、续稿、三集》,龚用卿《云岗选稿》,罗洪先《念庵罗先生集》,李春芳《李文定公貽安堂集》,唐汝楫《小渔先生遗稿》,申时行《赐闲堂集》,张元忭《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沈懋学《郊居遗稿》,唐文献《唐文恪公文集》,朱之蕃《奉使朝鲜稿》。有6位状元的别集被收入《四库禁毁书丛刊》,分别是:顾鼎臣《顾文康公续稿》,申时行《纶扉简牍》,焦竑《焦氏澹园集》、《焦氏澹园续集》,杨守勤《宁澹斋全集》,钱士升《赐余堂集》,刘理顺《刘文烈公全集》。收入《丛书集成初编》的有1种:张元忭《张阳和文选》。收入《丛书集成续编》的有2种:张元忭《张阳和文选》,焦竑《澹园集正续集》。

有7位明代状元的别集未被上述丛书收入,分别是:林环《絅斋先生集》(中科院图书馆有藏),谢一夔《谢文庄公集》(江西省图书馆有藏),舒芬《梓溪文集》(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图

书馆有藏)、《舒梓溪先生全集》(江苏省扬州市图书馆有藏) 林大钦《东莆先生文集》(广东中山图书馆有藏) 赵秉忠《淇山集》 张以诚《张宫谕集》、《酌春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有藏) 文震孟《药园文集》(辽宁省图书馆有藏)。

二、明代状元别集中的文体分布情形

从现存明代状元别集中 本文选择了37位明代状元(吴伯宗、胡广、曾棨、陈循、马愉、周旋、商辂、彭时、柯潜、黎淳、彭教、罗伦、张升、吴宽、谢迁、费宏、钱福、毛澄、康海、顾鼎臣、吕柟、杨慎、龚用卿、罗洪先、林大钦、李春芳、唐汝楫、申时行、张元忭、孙继皋、沈懋学、唐文献、焦竑、朱之蕃、杨守勤、钱士升、刘理顺)的别集 对其文体分布情形做调查统计 虽未达到竭泽而渔的程度 但已可大体说明问题。如果一位状元的别集存在多种版本 则选择作品较全的版本。这37种明代状元别集 基本上是按文体分类。所包含的文体有 策、论、判、制义、诏、敕、诰、告文、祝文、致语、箴、经筵讲章、说、解、训、偈、述、颂、赞、像赞、赋、碑(阡碑、庙碑、学田碑)、铭、表、奏疏、启、记、序、叙、引、赠序、典序、谱序、图序、寿序、贺序、别序、墓志铭(墓碣铭、寿塔铭、寿藏铭、生坟志、埋铭、墓表、墓记)、行状、传、哀辞、祭文、诔文、题跋、杂著、书、上梁文、帐词 五古、七古、乐府、五律、五绝、六律、六绝、七律、七绝、词、曲、谣等 近70种。不同的状元别集 文体命名、分类方法不尽一致。本文采取的方法是 删繁就简 先将上述状元别集中的文体分为文和诗两门 再将“文”门中的细目合并为13个大类 将“诗”门中的细目合并为古体、近体、词曲三大类。在此基础上 对37位明代状元别集中各文体的分布情形进行了全面统计。结果如下：

文 共计7674篇

科举类(馆课、经义、策论等 其中状元殿试策22篇)	189篇
诏令类(诏、敕、诰、告、祝、祭、制谕、致语、册文等)	167篇
奏议类(表、奏、疏等)	473篇
赠序类(典序、谱序、图序、寿序、贺序、赠序、别序、叙、引等)	1922篇
题跋类	488篇
杂记类	617篇
杂说类(议、说、考、解、辩)	78篇
书牋类(书、启、柬、简牍)	1489篇
碑传类(墓志铭、墓碣铭、寿塔铭、寿藏铭、生坟志、埋铭、墓表、墓记、行状、传、族谱)	1406篇
哀祭类(哀辞、祭文、诔文)	465篇
辞赋类(辞、赋、颂、赞等)	321篇
箴铭类	59篇

诗 共计14423首

古体 2375首				近体 11332首								词曲 716首(套)	
四言	五古	七古	杂言	五律	五排	五绝	六律	六绝	七律	七排	七绝	单曲	套数
23	1221	865	266	2721	312	679	6	46	4899	26	2643	682	34

三、“最重要”的文体和“最不重要”的文体

明代状元作为科举制度下的一个特殊群体,其别集也具有相应的特殊性,值得我们予以充分重视。从前述统计数据看,就“文”而言,赠序、书牋、碑传是数量最多的几类文体,辞赋、箴铭较少。在“诗”的三个大类中,近体远远超过古体,而词曲的数量最少。在近体中,七律又是数量最多的。以上数据,传递给我们怎样的文化信息呢?

(一)赠序、碑传、书牋——“文”中的“三鼎甲”。就“文”这一大类来看,状元别集中的“赠序”在数量上占有明显优势,达1922篇,甚至超过了日常生活中应用广泛的“书牋”(1489篇)。而“碑传”的数量也相当可观(1406篇)。考虑到“书牋”有不少是信笔写成,篇幅短小,而“碑传”则较为庄重,篇幅也长,因此“碑传”应列在“书牋”之前。这样,“文”中的“三鼎甲”依次为赠序、碑传、书牋。

赠序、碑传、书牋都是应用性文体。书牋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数量偏多乃题中应有之义。需要提出的是,赠序、碑传何以占有如此大的比重?

先讨论赠序。古代以序名篇的文章,范围广泛,不限于为书作序。朋友聚会时相互酬唱,有诗序;请画工将聚会的场面画下来,有图序;升迁时,有贺序;送行时,有别序;贺寿时,有寿序;吊唁时,有挽诗序……明人的社交几乎离不开序。其中包含了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

“赠序可以说是由诗序演变而来”^③。直至明代,赠序和诗之间仍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诗在唐代之后日益繁荣,诗的社交功能也越来越明显。一个不宜忽略的事实是:文人的聚会,人人有诗,但不一定人人有序,有时候只推出一个人作序。所作的诗,一部分是泛泛应酬之作,就随作随弃了。所以在古人的别集中,有时候只见到序,未必能找到对应的原诗。因被推举出来作序是一种荣耀,这些赠序如不收入别集,反倒是不正常的。

明代状元身份特殊,在社交中常常处于光环的笼罩之下,其作序的几率因而远较其他进士为多。这是其别集中赠序之作比重偏大的主要原因。

再讨论碑传。本文所说的碑传,主要指墓志铭、墓碣铭、寿塔铭、寿藏铭、生坟志、埋铭、墓表、墓记、行状、传等。古代的碑还包括纪功碑文、宫室庙宇碑文等,但在明代状元别集中,这一类的碑文数量相对较少。

碑传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魏晋时期,这一类文体就受到高度重视。如曹丕《典论·论文》将文体分为四类,其中一类即“铭诔”。铭诔的铭,也包括墓志铭在内。陆机《文赋》提及十种文体,其中第三种文体即“碑”。古代的碑传文,往往是史官修史的重要依据。而碑传文作者的身份地位,直接关系到传主能否“名垂青史”。可以说,明代状元之所以常被约请撰写碑传,也同他们常被约请撰写赠序一样,首先是因为其身份地位异常重要。

(二)状元策与八股文——科举文体的不同待遇。明代与科举有关的文体,包括《四书》义、经义、论、判、诏、诰、章、表、策等。就别集的编选而言,策是最受重视的文体,八股文(《四书》义和经义)则是最不受重视的文体。在我们考察的状元诗文别集中,有22种收有状元的殿试策,且置于突出位置。有些别集未收状元策,是因别集不全,乃后人搜辑遗篇编订而成,并非有意不收状元策。而八股文则是被有意识地排斥在别集之外的。同样是科举文体,何以有如此不同的待遇?

八股文源于宋代的经义,是在明代成熟并盛行的一种考试文体。明以前的别集,无八股文可收,可以不去讨论。明人的别集,也通常不收八股文,则主要是由于三种原因:1.八股文资历

太浅。一种文体如果没有悠久的历史,就难以获得高贵的身份。八股文尽管作为考试文体非常重要,但只是敲门砖意义上的重要,而并没有为它赢得尊贵的身份。2. 古人的文章,重在表达个人关于社会人生的见解,而“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却是揣摩他人的语气说话。尽管所揣摩的多是“圣贤”的口气,但毕竟不是个人的见解。3. 八股文因过多承担作为一种考试文体的功能,在形式方面有太多的限制,在表达见解方面反不如散体的古文来得舒展,它也因此而受到轻视。如,状元吴宽就提倡古文,反对仅仅“以举子业为事”。他称“今之号为时文者,拘之以格律,限之以对偶,率腐烂浅陋可厌之言”^④,说的就是这种情形。

比较而言,策的资历就深多了。汉代即有董仲舒著名的“天人三策”。《文心雕龙》将策归为“议对”,视其为“议之别体”,“对策揄扬,大明治道”,“对策所选,实属通才”^⑤。《文选》把策问列入严格的“文”的范围。直到清代,策问和对策依然备受选家或作家的重视。明代状元中,殿试策最著名的,有曾棨、罗伦、林大钦等。他们也因殿试策而获得了殊荣。

策之所以受重视,不只是因为其资历深,更因为它属于“经济之文”。明代于慎行曾将“文体”分为三类:

今之文体当正者三,其一,科场经义为制举之文;其二,士人纂述为著作之文;其三,朝廷方国上下所用为经济之文。制举、著作之文,士风所关,至于经济之文,则政体污隆出焉,不可不亟图也。然三者亦自相因,经济之文由著作而弊,著作之文由制举而弊,同条共贯则一物也。何者?士方其横经请业、操觚为文,所为殚精毕力、守为腹笥金籀者,固此物也。及其志业已酬,思以文采自见,而平时所沉酣濡馘入骨已深,即欲极力模拟,而格固不出此矣;至于当官奉职,从事筐篚之间,亦惟其素所服习以资黼黻,而质固不出此矣。雅则俱雅,弊则俱弊,己亦不知,人亦不知也。^⑥

于慎行将当时的文体分为制举之文、著作之文、经济之文,其地位依次上升。八股文属于“制举之文”,地位不高,策论虽也是“制举之文”,但人们又习惯性地视之为“经济之文”,其地位非八股文所能同日而语。状元别集通常收策论而不收八股文,这是根本的原因。

(三)七律受青睐,词曲被冷落。从数量看,诗中各体的排列顺序依次是近体(11332首)、古体(2375首)、词曲(716首);在近体中,依次是七律(4899首)、五律(2721首)、七绝(2643首)。近体占了绝对优势,是古体的五倍,而在近体诗中,七律又占据了将近半壁江山。个中原因何在?

就古体和近体而言,其原因在于,近体尤其是七律用于社交较为方便。古体与近体在形式上存在显著差异。近体诗主要指律诗。律诗是在两晋至南北朝逐渐形成,而在初唐确立下来的。其特征是格律严密。以八句四韵为定格,其中第三句和第四句、第五句和第六句必须对仗,每句之内、句与句之间必须按固定格式调配平仄,第二、四、六、八句必须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通常只押平声韵,而且必须一韵到底,不能邻韵通押。分五言、七言两体,每句五言者称为五律,每句七言者称为七律。与律诗相比,古体诗则自由得多。比如,每篇的句数长短不拘,每句的字数无严格限制,押韵的方式灵活多样,于对偶没有特殊要求,音节纯任自然,没有固定的规律和限制。由于这种形式上的差异,古体诗易学而难工,近体诗难学而易工。古体诗侧重于情感的自然流露,不宜用于应酬。而近体诗有一套成熟的写作规范,只要能够熟练运用基本的格律和对偶知识,就能够写得音韵铿锵、形式工稳,足以应付场面。所以,一般的文人,在社交中需要酬唱的时候,更倾向于选择近体诗。

近体诗又可分为律诗和绝句。在考察律诗与绝句之异的过程中,明人较多地注意到杜甫。

原因在于,杜甫作为律诗大家,其绝句的成就却相当有限。这极有说服力地表明,律诗与绝句的创作有着很不相同的路数。大体说来,绝句重在暗示,重在启迪,宜于凭直觉领悟;它如一道美丽的风景,“直下便是,动念即乖”,着意求之,殊悖本旨。杜甫偏爱对偶和典故,刻意雕琢,语意分明,用在律诗上见其长,用在绝句上却成为短处。比照律诗和绝句的这种差异,我们可以说,就社交场合而言,律诗是较为方便的。在律诗中,功力和技巧有较大的用武之地。换句话说,律诗的难处,是可以凭借知识和经验来补救的,对于从小受到训练的古代文人而言,并不是什么难事。而绝句的难处,却是不能凭知识和经验来补救的。律诗尤其是七言律诗,用于社交场合,具有绝句所无法比拟的综合优势。

就词曲而言,其原因在于,词曲被认为体格卑下,不受上流文人的重视。从状元别集中的文体数量来看,词曲有716首,包括34首套曲,数量虽然也不算少,但应该注意,这些词曲的作者主要集中于少数状元,特别是康海和杨慎。明代状元大多只有诗文别集,没有词曲别集。有词曲别集的,只有康、杨二人。康海《汧东乐府》(二卷)有小令(散曲、南曲)239首,带过曲2首,套数34首。杨慎《升庵长短句》(三卷)收197首,《升庵长短句续集》(三卷)收108首。不仅在明代状元中,即使是在明代进士中,康海和杨慎的词曲创作都是引人瞩目的。

明代状元的诗文别集中,收入的词曲更是寥寥无几。在我们选的37位明代状元的别集中,吴宽《匏翁家藏集》有“诗余”34首,谢迁《归田稿》有词2首,费宏《明太保费文宪公文集选要》有祝寿词2首,康海《康对山先生集》未收其词曲,顾鼎臣《顾文康公文草、诗草、续稿、三集》共收词26首,杨慎《升庵全集》有词13首(皆收入《升庵长短句续集》中),龚用卿《云岗选稿》有词26首,李春芳《贻安堂集》有词1首,焦竑《焦氏澹园集》卷四六收“诗余”36首,焦竑《澹园续集》卷二七收“诗余”9首。在上述9名状元中,谢迁、费宏、李春芳集中只有一、两首词,可忽略不计。这样,除去康海和杨慎,只有4名状元曾留意于词的创作。有些状元的词曲或有可能散见于其他文献,但已无足轻重。

康海和杨慎之所以在词曲创作方面取得了较高成就,与他们在仕途上遭受重大挫折直接相关,可以说是脱离状元正常生活轨道的结果。

康海的家乡陕西是“关学”的发祥地。关学创始人张载有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⑦这句话激励着无数关中后学奋发图强,康海亦是其中之一。康海中状元后,积极倡导秦汉文风,成为“前七子”之一,表现出志在“兼济”的豪情。正德年间,太监刘瑾乱政。康海为了拯救下狱的好友李梦阳,向刘瑾求情。后来刘瑾垮台,康海受刘瑾案牵连,退出政治舞台,同时也主动从复古运动中隐退。他后半生隐居乡里,大部分时间以词曲消磨时光。焦竑《玉堂丛语》记载:“康海罢官,自隐声酒……时鄆杜王敏夫名位差减,而才情胜之,倡和词章布人间,遂为关西风流领袖。浸淫汴洛间,遂以成俗……康海答寇子惇云:‘放逐后,流连声伎,不复拘检,虽乡党自好者,莫不耻之,又安可与士大夫同日语者!阮籍之志,在日获酩酊耳。三公、万户,非所愿也。’”^⑧康海说得明白,他的词曲创作,是其仕途绝望之后的一种选择,是在被逐出上流社会后的无奈选择。

杨慎的经历与康海有相似之处。武宗没有子嗣,他去世后,其堂弟朱厚熜以外藩的身份继位,是为世宗。在嘉靖初年发生的“大礼议”风波中,以杨慎的父亲大学士杨廷和为代表的护礼派落败,杨慎也因为不肯改变政治立场,被世宗流戍云南,宣告了其政治生命的终结。杨慎后半生埋首治学,诗酒自放:“尝醉,胡粉傅面,作双丫髻插花,门生舁之,诸伎捧觞,游行城市,了不为忤。”^⑨“至若陶情艳辞,寄意声伎,落魄不羁,又慎所以用晦行权,匪恒情所测。”^⑩杨慎钟情于词曲写作,也是明知不能重返政坛而做出的无奈选择。一个有志用世,有才用世,而又被堵

塞了用世之途的人,如果不用词曲来消磨壮心,他又怎能承受住这种心理的痛苦?反过来说,如果康海、杨慎仕途顺遂,他们又怎么会用如此多的精力来写体格较卑的词曲?

四、文学史视野下的明代状元文学

在文学史视野下考察明代状元文学,有两个不同的视角。

一是纯文学视角。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者大规模地采用纯文学观衡估古代文学,在文学史的撰写中表现出两个倾向:其一,强调诗、文、小说、戏曲为文学所特有的样式,文学史要以这四种文体为主要的叙述对象。符合现代文学观念的古代文体被划分到相应的领域,如诗、词、散曲属诗歌,古文、骈文、小品文属散文,等等。并按照“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思路,格外突出《诗经》、楚辞、汉魏乐府、唐诗、宋词、元杂剧、明清小说在文学史中的位置。其二,在著述方式上,强调文学史规律,大量采用现代文学理论的术语对古代作家作品进行分析评价,论述注重条理化和逻辑化。有一个现象值得一提,即20世纪初年的文学史不太看重绪论、导论之类,20世纪30年代以降,绪论、导论越来越受重视,对文学史的统领作用也越来越强。注重绪论和导论,是注重条理化和逻辑化的表现。从纯文学视角看明代状元文学,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明代状元文学很少文学史意义。理由是,其一,他们在小说领域基本上没有建树,他们的戏曲创作不成规模,他们的诗多为应酬之具,他们的文章多是实用的产物。其二,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唐代是诗的时代,宋代是词的时代,元代是曲的时代,明代是小说的时代,而明代状元恰好在小说领域留下了一片空白^①。这些理由,说来头头是道,但却是用一种理论强行裁剪文学史事实的结果。

二是杂文学视角。明代状元别集的主体部分,以实用性的文体和应酬功能较强的文体(如七律)为主,这似乎就注定了这些作品没有文学史意义。其实不然。清代的沈德潜在编选《清诗别裁集》时,曾致力于区分在酬赠时写诗和将诗作为酬赠之具这两种不同的情况。在沈德潜看来,应酬宴饮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对于诗人来说,关键问题不是拒绝在诗中涉及酬酢宴饮等内容,而是如何做到在创作中不流于应酬,使酬赠之作具有超出应酬的价值。因此,沈德潜在《清诗别裁集》的作家作品评议中特别强调赠答、送别诗的“体”、“格”。“时送行诗汇成卷轴,剧多名作,然颂扬得体,无逾此章。”(评吴襄《送徐澂斋先奉使琉球》)^②“极乱后宜以宽严相济处之,文翁、武侯其前事也。赠言之体如是。”(评严允肇《送宋荔裳按察四川》)^③“此言抚吴大臣,推周文襄忱、王端毅恕、海忠介瑞,而冀公之追步前哲也。此种立言,得吉甫赠人之体,诗亦穆如清风。”(评韩莼《赠江南巡抚汤潜庵先生》)^④“入山修炼,非儒者事,况有慈亲在耶?送之即以招之,得赠人以言之体。”(评濮淙《赠方望子入黄山修炼》)^⑤所谓“体”、“格”,就是身份,就是品格。没有品格即流于应酬,超越了应酬即是得“体”,即是有“格”。沈德潜认为,那些发自内心的酬唱诗与登临凭吊之作一样,是受外物激发而内心有所感触的产物,这类诗作同样具有打动人的力量,能发挥化导人心的作用;只有那些疲于应酬,随口赠答,并无真情实感的应酬之作,才是不可取的。因此,在对酬酢之作进行取舍时,沈德潜并不只从题材着眼,一概加以排斥,而是着眼于内涵加以选择。

由沈德潜对“体”、“格”的论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明代状元别集中,许多作品的确具有实用和应酬的功能,但实用和应酬不是这些作品的全部价值,在文学史视野下考察这些作品,实用和应酬甚至不是这些作品的主要价值,其中颇有一些杰作。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指出,对明代状元别集的研究还有另一层文学史意义,即有助于我们把握明代的文学生态。20世纪流行

的纯文学观,仅以小说、戏曲和少量的诗文流派来建构明代文学史,难免留下很多断层。大量的文学史信息和文学史景观被忽略掉了,或视而不见。要想填补这些文学史的断层,仅凭推断和想象是不够的,而应尽可能地走近历史,尽可能地还原历史。重返文学史现场也许只是一种愿望,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大量丰富的文学史细节和文学史景观置之不理。认真研究明代状元别集,可以对明代文学获得更多的现场感。在明代这个科举社会的鼎盛时期,不深入考察明代状元别集,对文学生态的了解就可能是残缺不全的。

- ① 查继佐《礼、兵二部尚书余煌传》,《国寿录》卷三,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107册,台湾明文书局1991年版,第98页。
- ②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二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550页。
- ③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增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83页。
- ④ 吴宽《送周仲瞻应举诗序》,《家藏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⑤ 杨明照等《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333、334页。
- ⑥ 于慎行《谷山笔麈》卷八《诗文》,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4页。
- ⑦ 张载《近思录拾遗》,《张载集》,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376页。通常引用张载此段名言作:“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 ⑧ 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任达》,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4—245页。
- ⑨ 李绍文《皇明世说新语》卷六《任诞》,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088册,第429页。
- ⑩ 傅维麟《明书》卷一四七《杨慎传》,周骏富辑《明代传记丛刊》第022册,第396、397页。
- ⑪ 笔记是状元较为偏爱的一种文学体裁,许多状元都曾涉足这一文体。如商辂《蔗山笔麈》、彭时《彭文宪公笔记》、焦竑《焦氏笔乘》、《玉堂丛语》、《焦氏类林》、秦鸣雷《谈资》、张懋修《墨卿谈乘》、文震孟《姑苏名贤小记》等。这种笔记不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杨慎的《仓庚传》及假托汉人之名写的《杂事秘辛》,略具传奇小说意味。除此之外,状元很少涉及小说(特别是白话小说)的创作。明代书商为了牟利,往往假托状元之名来推销小说,如假冒杨慎批点的《隋唐两朝志传》等,皆不可信,兹不一一讨论。
- ⑫⑬⑭⑮ 沈德潜《清诗别裁集》,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408页,第94页,第174页,第358页。

(作者单位 武汉大学文学院、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 山木